

《太平廣記》文本的民間敘事特徵以及關於 預知未來型故事研究的一些思考

朴 美 愛*

<目 次>

- | | |
|-----------------------------|-----------------|
| I. 引 言 | IV. 《太平廣記》文本中的 |
| II. 《太平廣記》文本的民間敘事特徵 | “預知未來型”故事及其民俗內涵 |
| III. “預知未來”母題與
“預知未來型”故事 | V. 結 語 |

I. 引 言

我們已經知道“有人類就有故事”的事實。人們通過故事，可以表達自己的心願，是人們講故事的主要功能。那麼，人們共同追求的心願、願望到底是甚麼呢？當然，人人都會擁有各不相同的心願。不過，筆者認為人們一直追求的是無論做甚麼樣的事情都要平平安安、快快樂樂。這就是中國民間常說的“避凶求吉”的心態。人們想要“預知未來”的行為是一種從“避凶求吉”的心態中產生的民俗現象。在一般的民俗生活中，常常滲透着人們從“追求吉利”的心態中產生出來的“預知未來”行為。尤其是中國民間老百姓對“避凶求吉”的心態和從中產生的“預知未來”行為，具有很悠久的歷史淵源。我們通過過去很豐富的歷史文獻材料，都可以發現而溯源到有關“預知未來”心態或行為的種種民俗現象和民間故事。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

尚無形成科學思考和判斷的古人，在決定某一種事情時占卜未來吉凶，并根據其結果建立了對策，即占卜結果為吉卦時按原計劃行事。與之相反，占卜結果為凶卦時為了避免或減少凶險而做出相對應決策。所以預測未來成為古人最重視的頭等大事和生活智慧。大至預測國家命運、小至預測個人一生命運或一時運勢等，其運用範圍非常廣泛了。尤其，越追溯古代，這種現象越嚴重。其中，《太平廣記》一書帶有深為豐富多彩的有關“預知未來”的民俗事象以及民間故事材料。

《太平廣記》是宋太宗太平年間李昉等人撰修的一部著作。《太平廣記》內容廣博，數量龐大，也廣泛收錄了唐代以前的民間故事(指廣義的民間故事，即包括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等散文體裁的民間敘事)作品。而且，這些民間故事作品大量包含着很豐富的民俗事象內容，幾乎涉及當時民俗事象的各個方面，如飲食、服飾、迷信、宗教、祭祀、喪葬、婚姻、音樂、雜技、少數民族的遊戲等種種習俗和民俗事物。因此，我們也可以稱它為“民間故事的淵海”兼“民俗的寶庫”。由此可知，《太平廣記》是一部研究當時民俗和民間文學的重要文獻資料。

筆者還想說明，作為本文研究對象的《太平廣記》文本還包括當時文人記錄下來的民間故事作品和文人利用民間故事母題加工而創作出來的作品。這使得《太平廣記》文本更為帶有民間敘事特徵。下面，通過推究《太平廣記》文本的民間敘事特徵，為“預知未來型”故事研究提供資料上的科學依據。

II. 《太平廣記》文本的民間敘事特徵

學界通常把《太平廣記》稱為“小說的淵海”是無疑的事實。它對小說史上的價值和所錄小說的來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小說家類)》<太平廣記提要>¹⁾中已經說得很清楚，如“古來軼聞瑣事，僻籍遺文咸在焉。

1) 參見(清)永瑤、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

卷帙輕者，往往全部收入，蓋小說家之淵海也。”因此，小說史研究者頗為重視這部書。但中國古代對“小說”這個概念的理解是跟現在不同的。東漢時期，班固在《漢書·藝文志》稱：“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²⁾所以如淳注謂：“……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又見《隋書·經籍志》謂：“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途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避忌，而職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以觀其衣物是也。”³⁾

可見，班固對於上述小說起源的“稗官說”主張，為考究古代小說含有的民俗學意義提供很重要的線索。在傳統時期，被視為中國政治制度之一的官方歷史觀點認為“小說是渺小的、不可信的、卑賤的東西”，因為小說不同於高尚的正統歷史記述而大都由傳聞、輿論、不可信的事實、編造的故事、關於普通老百姓的故事等內容組成。儘管如此，小說仍融入到了中國正統文化之中，而其原因在於小說所編寫的故事和諷刺手法可以充當為了解民衆情感的指標，即小說反映了民衆的思想感情，而統治階層搜集這些小說和記錄民衆的聲音，把其應用到了政治的目的上。由此看來，當時流傳在民間的故事之所以能夠成為小說的主要原因，應歸結於執政階層為了確立統治理念，或者部分知識階層出於個人的興趣而關注民間故事並把它們整理和加工。

另一方面，中國現代學者余嘉錫提出了更詳細的見解。⁴⁾他認為，收集、稟報民間故事的朝廷官吏就是最初的小說作家。據說，以前有一種官吏專門為統治階層收集和稟報民衆意見和情感，而這一說法給班固的小說產生理論提供了基礎。

由此可知，當時君王為了解風俗民情，特派稗官收集在民間流行的軼聞

731頁。

2)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

3) (唐)《隋書·經籍志》。

4) 參見余嘉錫,《小說家出於稗官說》,載於《余嘉錫論學雜著(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1月)第265~279頁。

瑣事。當時的“稗官”正是擔當現在的民俗學者採集民俗志(包括民間故事)的角色。可見，傳統小說雖成爲記錄當時風俗習慣或者文人作家玩文學的消遣工具，但從某些意義上可以推測，最初的小說在風格上更加接近於現在的故事。當時的小說不僅是娛樂用讀物，而且也是可以口傳的消遣用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講，說《太平廣記》文本也具備了小說的民間敘事特徵，絲毫不爲過。斷言之，從稗官收集的軼聞瑣事變來的“小說”在《太平廣記》文本中仍然帶有民間敘事特徵。

另外，在談論《太平廣記》文本的民間敘事特徵時，還有幾個不容忽略的因素。首先，它記載了具有從故事性轉爲小說性特徵的敘事物。也就是說，它記載了口頭文學轉性爲記錄文學的過渡期敘事物。當然，兩者都有“敘事陳述(即口述或筆述某一件事情或一連串事情)”⁵⁾的共同特徵。但口頭文學指爲民間廣汎口傳的敘事文學，而記錄文學指爲知識階層以文字記載的敘事文學。兩者在起源和發生上，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尤其對小說來說，它的起源和發生根源來自故事，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小說從故事中取材，容納主題或構成方式等因素，被再創作，得到持續的發展。另一方面，民間敘事的口傳作品通過以下過程被傳承和記錄，從這一點上也不難看出《太平廣記》的民間敘事特徵。其傳承和記錄過程如下：事實(或事件) → 觀察者(初頭證言) → 連串傳達(傳聞或連串證言) → 最後傳達者(最後證言) → 記錄者(初期記錄文獻)⁶⁾。接着，這種過程可以繼續發展，而反復循環⁷⁾。可見，

5) 參見魯曉鵬,《From Historicity to Fictionality: The Chinese Poetics of Narrative》(可譯爲《從史實性到虛構性:中國敘事詩學》), (江陵:圖書出版路, 2001年7月)第42頁。

6) 參見(韓)李相日,《說話體裁論》,載於金烈圭、李相日等人共著,《民談學概論》, (首爾:一潮閣, 1997年)重版,第30頁。

7) 關於民間敘事傳承和記錄的循環模式,正好董乃斌和程薈兩位先生曾經做過明確的概括。他們提出的循環模式如下:民間敘事 → 文人記錄 → 文本化 → 權力者介入 → 經典化 → 反哺民間 → 新的民間敘事 → 新的文本和經典 → 新老民間敘事和經典化文本并存的多元化局面。通過這種循環模式,他們強調的是民間敘事、文人敘事和經典敘事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這些敘事文本并存的多元化局面。由此可見,《太平廣記》是屬於上述循環過程中“經典化”階段的敘事文本,

《太平廣記》文本具有被文人記錄成爲固定化的初期文獻特徵。

其次,《太平廣記》故事即是文學性“虛構”和歷史性“事實”并存的軼事,又是帶有“准民間故事”⁸⁾性質的敘事物。這也是不容忽略的一面。有些學者曾經說過,中國古代小說是“歷史的事實”與“文學的虛構”相互交叉的文學樣式。這恰恰是與日本著名民俗學者柳田國男先生在《傳說論》⁹⁾中提到的民間傳說故事的性質相吻合的。對於這種觀點,在《中華民間文學史·傳說編》¹⁰⁾一書,也涉及到與此相關的內容,即若把“小說”定義爲個人創作的虛構性敘事文學作品,那麼《太平廣記》的大部分便與之不合,因爲它們大多是文人對於傳聞的載錄,而不是自主的創作,應屬“前小說”性質,把它們當做傳說的文本來看,倒是比較確切的。

韓國學者李相日先生在《說話體裁論》中,也提出了比較明確的說明。從他對軼事和傳說的概念上,可以了解一些《太平廣記》故事的民間敘事特徵。以上所述,屬於“准民間故事類”的軼事,是爲突出某一歷史人物或值得關注的事件、時代,並爲塑造某個身份階層的性格特徵,雖篇幅簡短,但捕捉重點,把其形象化的故事形式。所謂軼事,在形式上以簡單闡述客觀事件的簡潔性和簡明扼要的突出性結構爲特點,描寫生前聞名於世的人物,私自的一面事迹爲主題,反映其人物的代表特徵。其實,不只是人物,而是某一民族、社會組織、時代精神的定向等,其特徵通過軼事被決定。但是,這些帶有野史風格的軼事,雖然以真實存在的歷史事實爲依據產生,但實際上里面還參雜着傳說成分,所以很難分辨其歷史性真實。因此,軼事雖然以歷史事實爲根基,但它實際上是傳聞,即可說是虛構成分相當多的想象性結果

但它却具備了鮮明的民間敘事特徵。參見董乃斌、程蕾,《民間敘事論綱(上)》,載於《湛江海洋大學學報》第2期,(湛江:廣東海洋大學)2003年4月。

8) 參見(韓)李相日,《說話體裁論》,載於《民談學概論》,同上,第44頁。

9) 日本學者柳田國男先生曾經在《傳說論》之第七章《傳說的兩極(歷史,文學)》一文中提到:“傳說是架通歷史與文學的橋梁”。參見(日)柳田國男,《傳說論》,(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8年)第31頁。

10) 參見祁連休、程蕾主編,《中華民間文學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60頁。

物。

這些論述與維特·梅爾(Victor. H. Mair)關於傳統時期中國小說概念的部分說明是一脉相通的。他說明,“小說(文字含義為‘瑣碎的話’或‘不足掛齒的故事’)”這一用語在傳統時期中國詞源上表示“閑談”或“軼事”的意思,而在英語單詞中“小說(fiction)”表示被作者或作家所創作的東西。所以在中國,如果某一文學作品被稱為小說,我們就應該把它理解為閑談或傳聞。正因為如此,小說作家們為了更加清楚地闡明他們所記述的故事出自何人并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聽到的,而花了不少心思。¹¹⁾其實,《太平廣記》是以野談形式記述脫離正史的歷史事實或歷史人物神異行蹟的野史,即由稗官記錄而成的稗官文學性質非常濃厚的文本。這些野談所記載的軼事雖然取材於某些歷史事實,但很難與傳說區別。美國民俗學者德森(R. M. Dorson)認為,傳說追求歷史性和事實性,并要求說者和聽者都相信它的真實性¹²⁾。但傳說與歷史不同,它有非合理性和神秘性成分,而這種傳說的構成需要奇蹟般的超現實要素。甚至在歷史傳說中,為了突出重要人物或事件利用了超現實要素。因此,除超現實的母題中登場神鬼、陰差、怪物等超現實的存在外,還伴隨“預知未來”的超現實行為。換句話說,這些歷史傳說出現在野史、野談、稗史類作品當中,使人難於分辨其真實性。就算是強調真實性的傳說,其中也參雜着故事享受階層的想象。如此看來,傳說是最接近歷史的民間故事。由此可知,《太平廣記》敘事具有(歷史的)真實性和(小說的)想象虛構性之間的複合面貌。

韓國學者崔雲植先生對“野史故事中呈現的民間敘事意識”¹³⁾的考察也值得我們關注。野史故事是以野史為骨架添油加醋而成的故事,在廣義上講,它屬於民間故事。一直以來,歷史事實的野史故事從歷史觀點上被人們

11) 轉引自魯曉鵬,《From Historicity to Fictionality: The Chinese Poetics of Narrative》(可譯為《從史實性到虛構性:中國敘事詩學》),同上,第80頁。

12) 參見 R. M. Dorson, <Folklore—Selected Essays>, 轉引自(韓)李相日,《說話體裁論》,同上。

13) 參見(韓)崔雲植,《於野譚》中“於于堂”的說話意識,載於《說話》,(首爾:教文社,1989年9月)第21頁。

議論和認知。在野史故事中，歷史成分和故事成分并存，所以的確不好與野史區別。

同時，通過記述方式也能發現《太平廣記》的民間敘事特徵。《太平廣記》文本，有的“承於前載”，錄自著述之中，有的則由作者“采記近世之事”，來自當時人們的口頭傳說。其中，後者的記述方式，可分為“經歷記述(記述作家或作家周圍人物的親身經歷)”、“見聞記述(記述對人物或歷史事件的見聞)”、“故事採用(採用口傳故事為素材)”、“風俗和民間信仰的記述(記述當時的風俗習慣)”等幾種，最值得作為本文研究對象的當然就是這類作品。在記述態度上，這些作品可分為客觀而真實的歷史性記錄和按主觀意圖創作、增減的文學性記錄。雖然它們有時經過文人作者的加工，但具有較為完整的民間敘事特徵。正如曾經劉守華先生在《〈搜神記〉中的魏晉民間故事》¹⁴⁾中所說：“雖然難以考辨出它們就是當時人們口傳故事的實錄，然而篇幅簡短，結構單純，語言朴素，敘述人的觀念也較為朴素，以文字書面寫定時沒有加入過多的附會說教或文學藻飾，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之美，作品本文就較好地顯示出民間口頭文學的特徵，從而大大提高了它的科學價值。”《太平廣記》一書，正好具有如此的民間敘事特徵，就是輯錄了在博採民間口頭傳聞的基礎上加工創作而成的故事作品。

韓國學者張德順先生認為，口傳故事是通過記錄者被文字化的。從廣義上講，可屬於“故事文學(用韓語稱為‘說話文學’)”¹⁵⁾。但需要注意的是，“故事(說話)”在韓語中也包含着極為廣汎的意思，如神話、傳說、故事等。所謂的“故事文學(說話文學)”，就是這種故事以記錄者為媒體被文字化，而強調文藝性的名稱，即口傳的民間故事被文字化之後進而被記錄者文學化的結果物就是“故事文學(說話文學)”。所以他認為，這些“故事文學”與初期的“小說”密切相關，在故事文學研究中不僅應該觀察故事原有的文化特徵，而

14) 參見劉守華，〈〈搜神記〉中的魏晉民間故事〉，載於《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第1期，(武漢：華中師範大學，1996年)。

15) 在韓國，“說話”這一名稱，相當於漢語中的“故事”。參見(韓)張德順，〈韓國說話文學研究〉，(首爾：圖書出版 朴李鄭，1995年 10月)。

且還應該考慮文學面貌。他還進一步強調了應該同時考慮“故事的小說化過程”和“以故事為素材的小說”。但故事文學研究并不只強調故事的文學性，應該同時考慮凝聚在民間故事中的世界觀、人生觀、道德觀等意識結構和信仰、風俗、政治秩序等社會、文化面貌。

如上所述，只要認識到敘事文學從口傳敘事轉性為記錄敘事的事實，就能了解到故事作為小說前身，其各種性質以多種形態反映於小說的事實。因為文學隨着對人類的理解深化，從單純形態發展為複雜而精煉的形態，而不是隨着時代的變遷出現新的體裁。口傳文學到記錄文學的轉換，決定或改變了記錄文學的根本性質。總之，從以上觀點來看，《太平廣記》可謂是故事文學的集大成，而有些學者以“稗官文學”這個用語代替了它。且不說用語如何，但筆者認為民間故事情趣濃厚、強調文學性，並屬於前小說階段的記錄文學就是《太平廣記》一書的基本性質。

當然，想要找出《太平廣記》文本的民間敘事特徵，就不應該忽略以下幾個問題：即《太平廣記》故事雖然以口傳或文獻形式流傳的作品，但都是作家個人所創作的作品，且每個作家都有不同的風格，所以部分故事很有可能是通過修改和增減多多少少變形的衍生物。換言之，在把《太平廣記》文本作為民間敘事研究對象時，會發現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它不是純粹的民間故事文本。第二，大部分故事屬於人物傳說(軼事)或野史性質的故事，資料本身太簡單，故事結構不完整或與之相反地參雜了太多內容，所以已經變成記錄文學，而不再是純粹的民間文學作品。第三，很難在《太平廣記》文本中評論民間故事研究中成為重要問題的資料真實性。因為，《太平廣記》里也有從其他書本轉載過來的或隨意變形記錄的內容。這些問題有待於今後繼續深思。

綜上所述，《太平廣記》引用的書目共有三百四十多種，都包括經部、史部、子部、集部。但是，筆者想強調《太平廣記》大部分的故事內容是多採自稗官野史、筆記、傳記、雜記和小說，而作為主流的還是諸多文本中的民間傳說故事。由此可知，當時“小說”與“傳說故事”的概念是很模糊的，而且兩者都帶有相互交錯的性質。因此，作為稗官文學的《太平廣記》本身

就是具有兩層文化(dual system, 即“官與民”或“作家與民衆”)交錯特徵的敘事文本。本文研究的重点, 也在於從這個角度接近“文學”與“民俗”的共存以及相關關係。

III. “預知未來”母題與“預知未來型”故事

1. “預知未來”母題發生的歷史淵源

中國古代“預”字代替“豫”字在民間通用, 見《說文解字·象部》: “豫, 象之大者。…大必寬裕。故先事而備謂之豫。…俗作預。”¹⁶⁾又見《淮南子·說山訓》: “巧者善度, 知者善豫。”¹⁷⁾高誘注謂: “豫, 備也。”從此可知, “預”是事先有準備的意思。又看《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使聖人預知微, 能使良醫得蚤從事, 則疾可已, 身可活也。”¹⁸⁾再看《漢書·丙吉傳》: “時豈預知天下之福, 而徼其報哉!”¹⁹⁾如此, 中國古代人認為, 預知未來行為是預先知道將來的事情而事先準備的一種生活方式。人們往往因時間上的距離而處於未知狀態, 預知未來就是一種在這樣的未知狀態下探索未來吉凶以及謀求對策的行為。自古以來, 預知未來行為, 既是向來人們最關心而回旋在心頭的事情, 又是全世界普遍性的現象之一。

在中國, 人們對未來的預知活動從神話時期早已開始, 可以說是有人類就也有預知未來的活動。從殷墟卜辭看, 中國古代人早就利用龜甲、蓍草、結繩等工具, 對有關自然或者人類的種種事情進行過預測活動。這個時期,

16) 參見(漢)許慎(注)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59頁。

17) 參見(漢)劉安(注)許匡一,《淮南子(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63頁。

18) 參見(漢)司馬遷,《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重版)第2793頁。

19) 參見(漢)班固,《漢書·丙吉傳》。

政治與祭祀還未分開，上述的占卜活動積極利用於政治活動，統治者通過這種占卜活動求問神意并預測內容反映在政治上。古代人認為，有一個無所不能的神靈主宰天地萬物，并控制人事的一切。因此，他們爲了在發生某種事情之前求問神意，同時把握將來某種事情的吉凶變化，而找到神靈通過神秘的方式給予人們的預言線索。如《禮記·曲禮上》曰：“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²⁰⁾

至商周時期，人們對未來的關注內容轉移到探討宇宙人生的問題。例如，見《周易·繫辭上》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²¹⁾又見《周易·賁卦·彖傳》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²²⁾同時，隨着《周易》的發展，可以代表預知未來活動之一的占卜術就開始興盛，也出現了各式各樣的預知未來方式，并展現了這種現象從統治階級、上流階級、知識階級逐漸擴散到民間的風貌。

在先秦時期，也可以容易發現對“預知未來”活動的種種記載，如《左傳》等古籍中都能看到不少相關的內容。這個時期仍是由國家持着儒家的“天命論”立場進行集體性的預知未來活動。但實際上，中國社會春秋至漢代，是一個大動蕩、大分化的歷史時期。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組織都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這些社會上的劇烈變化，尤其是個人命運的大起大伏，以及時人對天象運動規律的初步的科學把握，發現“天象與人事”并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聯系。²³⁾從此可知，當時人們對“天命”觀念開始有懷疑，并不再認爲人事或者命運變化絕對靠於“天命”。

20) 參見(西漢)戴德、戴聖,《禮記·曲禮上》。

21) 此句意爲:“仰觀天文的變化,俯察地理的變化。因此,知道明明暗暗中的緣故。”《周易·繫辭上》。

22) 天文,即天象;人文,即人事之象。此句意爲:“日月星辰(天文)、人事家國(人文)都在變化。觀察其象,就是爲了把握其變化,以成順天應人之事。”《周易·賁卦·彖傳》。

23) 參見張明喜,《神秘的命運密碼》,(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11月)第13~14頁。

在兩漢時期，開始出現了關於“預知未來”方法的更為具體的理論體系。這時期在學術史上是一個極為發展的時期。因此，對於預知未來的觀念也產生了學術方面的自覺。見《漢書·藝文志·數術略》²⁴，將占卜(這也是一種代表“預知未來”行為的詞語)分為“天文、歷譜、五行、蓍龜、刑法、雜占”等六類。這種分類體系，為後來出現的占卜方法提供了基本框架。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隨着道教的盛興，之前以帝王為主進行的國家的集體性占卜活動逐漸轉移到關於個人命運的占卜，乃至發展為命運學。這種現象正好反映出於漢代早已流行的“命運可預知”的觀念。

到了唐代，預知未來的活動更為盛行，其內容也更加豐富，并展現出從上層到民間、從集體到個人的體系化的發展模式。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高峰時期。社會和政治的穩定、農業和經濟的發展、科舉制度的盛興、以及與西域文化的交流活躍等局面，給人們帶來了富足的生活，并在精神上使他們更為開放。由於這樣的時代背景，當時人們更有條件去注重預知未來的活動。與前時代相比，唐代的預知未來現象，不僅更為普遍廣泛，而且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唐代人們更多地開始關注起自己的命運，而他們進行預知未來行為的主要內容是預卜科舉和仕途。同時，隨着“預知未來”的熱潮，大量出現了在當時社會上已成為一種主要職業的人士，如相人、占人、釋夢家等。這些關於預知未來的鮮明的時代特徵反映在占卜、看相、算命的習俗上，便形成了“預知術”的汎濫和“命學理論”的深化。從此可知，唐代乃是“預知未來”的巔峰時期。

宋代是唐代的延長時期，和唐代的社會政治、科舉仕進等方面的情況不盡相同，而影響個人命運的政局變動、人事沈浮，仍然存在許多共同之處。在唐代命學理論的基礎上，更加深化其理論體系，使“預知未來”這種特殊的文化現象達到沸點。唐宋以來，日益呈現出來的從上層階層下移到民間的趨勢更猛。

明清時代“預知未來”現象的盛況也不亞於前代。至於有關的記載或例

24) 參見(漢)班固,《漢書·藝文志·數術略》。

子，更是舉不勝舉，此不贅述。這樣，“預知未來”的活動不是限於某一個時代、地區和民族，而是至今還在民間廣汎流行的跨文化現象。

綜上所述，在中國有關“預知未來”的文化現象豐富多彩，而且它具有很悠久的歷史文化淵源。長期以來，這種文化現象刻印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尤其是中國古代人對自然現象的客觀理解還不如現在。因此，他們對事象的神秘產生好奇心、求知欲，而對未來的光景渴望知曉。其實，這些都是人類的天然感情。從這樣的感情出發，人類就興起了對未來的預知活動。這種人們對未來命運變化的關注，也通過文學形式被形象化，進而被許多文學作品廣汎接受。其實，不只是包括小說、戲曲、詩歌和詞賦等體裁的文學作品，而在《左傳》、《史記》、《漢書》等史書里也經常發現關於“預知未來”的記錄。同時，《淮南子》、《論衡》等古文獻中也反映了中國古代哲學家們對“預知未來”的種種觀念(包括關於命運的各種學說)。從此可知，“預知未來”這個跨學科主題，是貫穿於文史哲等多種範圍人文內容的文化現象。

2. “預知未來型”故事的文學表現

如上文所言，有關“預知未來”的故事是從上述的時代要求應運而來的。筆者認為，要推進《太平廣記》文本中的“預知未來型”故事研究，首先應該對該類型故事的概念進行討論，以明辨此類故事的類型特徵，確定本文研究的對象和範圍。

顧名思義，“預知未來型”故事就是“通過預知未來行為預測到自己未來吉凶的人所經歷的故事”。更具體地說，在故事里處於缺乏狀態(有時不一定處於缺乏狀態)的主人公靠自己的能力或得到助手(這一類的故事中通常是預知者)相助，事先知道未來某件事情的吉凶變化之後，經過一番周折²⁵⁾，得到與預知內容相符的結果或相反的結果。此時，預知未來行為在敘事過程中必

25) 本文稱這一過程為“實現過程”。有時，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一個助手幫助主人公實現被預知的事情。

然出現，而且還應該超越故事素材(母題)的層面，對故事的主題和結構起到決定性作用。這要求登場人物和他們的行為密切關聯於“預知未來”主題。

日本學者關敬吾也對涉及“預知未來”內容的“命運故事”下了定義：“神之預言故事中主人公的死亡原因和時期、婚姻、貧富、禍福等其平生重要事件，而當事者盡管千方百計地避禍，最終還是失敗。這是神的預言始終變成現實的一系列故事。”²⁶⁾由此看來，這一定義與韓國學者朴明淑在博士論文《韓中命運說話比較研究》中提示的“命運故事”概念非常相似。她把命運故事定義為：“主人公為化解生活中出現的吉凶禍福等問題，與社會、自然、超自然領域交融的過程和所得到的結果反映故事傳承人命運意識的故事。”²⁷⁾她利用命運故事的“命運問題的提示 → 解決過程 → 結果”這一敘事過程，強調了命運故事中不僅有以“命運不能改變”為主題意識的故事，還有以“命運可以改變”為主題意識的故事。但她在命運故事應不應該包括與人類禍福相關的“預言故事”、“占卜故事”、“風水故事”等的問題上，表示了懷疑的態度。她認為，命運是由神靈(或上天)來決定的人生天理，它與預言、占卜、風水等類故事提示的一時運數有區別。當然，在預知命運的過程中，也許會出現預言、占卜等主題，但她說的命運故事是決定一生命運的故事，是在宿命性條件或情況下發生敘事糾葛，並在敘事過程中通過故事主人公和命運之間矛盾、對立、結果來展示命運意識的故事。

韓國學者鄭在珉在博士論文《韓國命運說話及其命運觀研究》一文中也定義為：“所謂的命運故事就是以個人的命運為素材、陳述其命運實現或變革的故事。”²⁸⁾他論述，這些命運故事中有時出現對命運的預言或進行預言的異人，但預言故事(即“預知未來型”故事)中不僅有關於個人命運的預言，也有關於氣象、戰爭、國家或社會組織命運等內容的預言。這些預言情節對於故

26) 參見(日)關敬吾, <運命譚: 其系統與分布>, 轉引自(韓)朴明淑, 《韓中命運說話比較研究》, 首爾大學校 博士論文, 2007年, 第3頁。

27) 參見(韓)朴明淑, 《韓中命運說話比較研究》, 首爾大學校 博士論文, 2007年。

28) 參見(韓)鄭在珉, 《韓國命運說話及其命運觀研究》, 首爾大學校 博士論文, 1998年。

事中的必然性和結果中起到不同於命運故事的作用。總之，預言故事的焦點在於預言的提示及其實現過程。但朴明淑把焦點放在人的命運意識上，對與“預知未來型故事”思路相同的“命運故事”進行了研究，而本文研究與之相反，把焦點放在“預知未來”的行為上。眾所周知，故事反映民衆的各種意識結構和生活情況，而這些行為在預知未來型故事中對敘事的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並反映故事傳承人的各種意識結構。那麼，預知未來行為在故事中表現為何種形態呢？要特別強調的是，本文要通過對這一問題的文學考察，在故事中同時找出預知未來行為以非一種的多種方式裝載多種內容的民俗原因和含義。

在這類故事中“人的未來命運”問題成爲敘事焦點，所以故事在發生問題時同時開始，在問題得到解決時同時總結。故此，其敘事結構上，一般可以簡略地概括爲“問題狀況(缺乏、危機、困難等)”和“解決問題(滿足缺乏、克服危機、擺脫困難等)”兩個要素。這些要素是理解民間故事內涵意味的重要線索。在這種意義上，着眼於“問題狀況”和“解決問題的方式”是更有效地把握敘事內容的初步階段。從解決問題的過程來看，只要了解“問題狀況”，才能“解決問題”，即只有“知”，才能“解決”，因爲人們的恐懼是從無知中產生的。因此，“預知未來”母題，既是解決問題的一種線索，又是理解故事內涵的重要關鍵詞。²⁹⁾

另外，在這一類故事中發生的問題大體有兩種：一種，是在故事的前半部發生問題，然後爲了解決問題(作爲解決方法之一)利用預知未來行為；另一種，是起先不知道問題的存在，而後來通過預知未來行為認知問題，此時同時摸索解決方法。故事中的問題大體爲“貧寒”、“無錢”、“疾病”、“地位低微”、“無職”、“無子”等缺乏因素，從心理學表現角度上可以把它稱爲“力量不足”、“能量不足”。在這種情況下，這種“不足”狀態就會成爲事件的重要起因。

筆者在分析這類故事時，曾經發現了六個經常出現的要素，因而把它們

29) 拙稿，《華北“預知未來型”故事研究》，北京師範大學 碩士論文，1999年。

作為這類型故事最基本的構成要素。張衛中先生<<左傳>>預言探析>³⁰⁾中說：“所謂預言，應該由五個要素組成，即預測者(本文命名為預知助手)、預測根據、預測方法、預測對象、預測結果”。他對“預言”的這種五個要素的提法，對筆者有所啟發。但筆者還認為，從認識“民衆主體”的角度，有必要加上第六個要素(即“預知主體”)，因為老百姓本身的想法是我們認識這類故事的基礎。這樣，本文設定的六個要素為：預知主體(想預知未來者或命運當事者)、預知助手(預知者)、預知工具(預知方式)、預知對象(預知內容)、預知過程和預知結果。它們在故事中與各種情節單元相結合，分別回答“想要預知未來的人是誰?”、“預知未來的人是誰?”、“用甚麼工具來預知未來(或實現願望)?”、“預知對象是甚麼?”、“通過甚麼過程(或儀式)?”、“預知的結果怎麼樣?”等問題。再者，我們又不能錯過與“預知未來”內容參雜在一起的實現過程，即這是展示如何實現預知內容的過程，在這類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筆者根據前述六個要素以及實現過程，對從《太平廣記》文本中找出的這類故事進行分析，並做表概括其大體的內容。

下面，舉一個典型的例子來，觀察這類故事大體的敘事特徵：

出 處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三十五(徵應一) ³¹⁾
故事類型	風水型：個人命運(出世)型：實現型
故事題目	宋明帝
預知主體	宋明帝(登極為皇帝之前)
預知助手	河洛(預知助手)
對 手	少帝(性情狂暴的皇帝)
預知內容	神靈七曜都出現在東南角。(+) (暗示：主體將要登極為皇帝)
預知工具	風水寶地

30) 參見張衛中，<<左傳>>預言探析>，載於《古典文獻與文化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301~314頁。

31) “宋明帝自序云：‘予初封湘東王，居侍中衛尉府。孝武皇帝為予(“予”原作“子”，據明抄本改。)置蕭惠開宅邸，經營方始，鑿池，獲赤玉一枚，色如練朱，半圓半方，

預知過程	1. 主體從來不喜歡現住的住宅。 (主體與皇帝的關係不太好) 2. 主體跟別人換了住宅。 3. 預知助手預言說, 主體的新住宅是個風水寶地。
預知結果	後來, 主體成爲皇帝。(+)
實現工具	住宅
實現過程	1. 搬遷到風水好的住宅。 2. 後來主體成爲皇帝。
實現結果	後來, 主體成爲皇帝。(+)

注 : (+) 爲正面結果 (-) 爲負面結果

通過上述故事材料的分析, 可以鳥瞰構成這類故事的幾個要素在敘事過程中的表現方式和功能。但筆者想要提示: 上述的故事只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而不能說爲《太平廣記》預知未來型故事的整體面貌。

首先, “預知主體” 在這類故事中, 它的身份主要是主人公。但也有例外, 主人公的角色功能, 有時分配給與預知主體相反的對手。預知主體參與預知活動的態度, 可分爲主動和被動兩種。主動的預知主體, 在故事中直接找預知者探尋未來之事或解決問題的方法。反之, 被動的預知主體, 則等待主動的預知者找他來預告未來之事或解決問題的方法。

其次, “預知助手”, 可被稱爲“預知者”, 其態度也分爲主動和被動兩種。在此, 經常出現主體與助手的態度截然相反的情況。助手一般是帶有超凡能力的異人, 如神仙、老人、和尚、道士、巫師、醫生等超凡人物。他們往往爲主體提供解決問題的重要線索。因此, 在這類故事中, 助手(即預知者)的形

重五斤, 光潤如瑩。世祖崩, 少帝繼位, 予自姑熟入朝, 居西邸。少帝狂暴, 惡聞直言, 醉爲非法。予驟諫之, 大怒, 乃使仗士防守。左右文武, 悉驚怖奔走, 西邸遂空。於是百姓悉入邸, 適意取物, 纖毫畢盡。至夜, 少帝醉醒, 意頗解釋。明日, 左右文武方還, 予於是不喜居於西邸。歷陽太守建平王景素, 私起宅於建陽門外, 始成, 予別覓一宅換之, 少帝許焉。予自西邸移新宅, 新宅在清溪西, 舊邸今湘宮寺。河洛讖曰: ‘靈囿豫見東南隅, 予二邸皆處宮城之東南, 且在巽(“巽”原作“吳”, 據明抄本改。)地, 盖天應也。’”(出《宋明帝自序》) 參見(宋)李昉等人, 《太平廣記》(第三冊), (北京: 中華書局, 1961年) 第965~966頁。

象更爲突出。助手可以把問題狀況直接告訴主體或者部分暗示，有時也可以直接參與解決問題的全過程。爲此，主體的活動範圍也隨之變化。

再次，所謂“預知工具”，是指發生或從事預知未來行爲時所利用的工具。故事中的人物利用它可以預測未來：例如，占卜時利用的龜甲、蓍草、大米等工具以及陰差的天書、天星、風水寶地、夢兆、異蹟等，都屬於預知工具的範圍之內。雖然有些工具是具體的事物，但預言、預兆、夢兆、風水、讖謠等“預知方式”也可謂是抽象的預知工具。這些預知工具(或預知方式)與故事流傳地區的自然地理或社會環境有密切關係。

復次，“預知內容”是比較複雜而需深思的構成要素。這與故事講述人的心愿、欲望、思想觀念有密切關係，對推動這類故事情節的發展起到較大的影響。通過《太平廣記》這類故事的分析，可以發現“預知內容”大概歸結爲關於個人命運(出生、婚姻、健康、貧富、出世、人際關係、生死等)、群體命運(家庭、村落和國家等社會群體的興衰以及戰爭問題)和自然資源(天氣預報、求雨止雨、讖寶)等三種情況。由此可知，預知未來活動涉及的范围極爲廣汎。

最後，“預知結果”是指預知到的內容經過某種過程在故事結局出現的結果。這類故事中一般出現“應驗”或“不應驗”等兩種預知結果，但有時也會出現預知結果不明顯的情況。這個要素可以與預知內容結合起來理解，并還需觀察預知內容和預知結果之間的敘事過程。這類故事的敘事過程，一般分爲“預知過程”和“實現過程”。所謂“預知過程”，顧名思意是進行預知活動的過程，包括預言、占卜、巫術、夢兆、看風水、看氣象等預知活動。所謂“實現過程”，是指實現預知內容的過程，包括婚姻、生子、吃藥、科舉、善行、修道、讀經等實現行爲，這個過程一般導致與“預知內容”相符的預知結果。相反，我們也需注意與“實現過程”相對的“破壞過程”。它還包括違背禁忌、騙人、盜墓、違約、惡行等不良行爲，則會導致與“預知內容”不符的預知結果。這些實現或破壞的過程，可與行爲主體的道德行爲聯系思考。

總之，預知未來型故事是由上述六個要素有機組合而成的故事類型。其實，這類故事不僅包括完備上述六個要素的典型故事，也包括由多個母題(或

情節)合并的“複合型”故事和由(上述六個要素之中)某個母題要素脫離或部分內容變化引起故事情節有些簡單化的“簡略型”故事。

綜上所述,預知未來型故事的敘事模式,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從預測人的幸運或厄運至應驗為止的敘事過程;二是,從預測人的厄運至完全克服厄運為止的敘事(前面所述的“改變命運型”屬於這一類)過程。前者是按照命運“預定論(定命論)”的單純敘事結構,而後者雖然以命運預定論為基礎,但它反映了人要通過努力克服命運的“造命論”意志。本文重視的是,在這種“存在論”認識層面屬於後者的敘事特徵。

下面,進一步觀察預知未來型故事的敘事發展過程。

第一段落,“提示部分”是在大體上提示預知者預示未來命運的內容。與此同時,介紹預知者的預知能力,來強調預知者的影響力,因為本文的研究對象多半具有知名人物的傳奇故事性質。人人都很想知道被秘密封鎖的自己未來,而預知未來型故事就是直截了當地反映這種欲望的文學形式。在故事中,隨着有能的預知者預測到某一個人或國家、民族等群體的命運,敘事的中心問題也被提出,而這種問題足以引發故事傳承人的異常好奇心,接着聽者(或讀者)就不得不關注以後的事件發展,而之後的敘事段落會讓這些好奇心得到滿足。這一段落反映“命運可以預測”的意識,它在預知未來型故事的敘事過程中成為最重要的段落。因為可以預測命運,所以知道了注定的死亡、貧窮、配偶等,而主人公當事者根據預測的結果採取積極的行動。因此可以說,預知未來型故事的基礎是以“命運可以預測”的意識為基底的“預知未來”行為。通過預知未來型故事可知,預測未來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遇到厄運時避開,遇到好運時認真努力取得好結果。而在這種目的方面,以下第二段落會被故事享受層關注。

第二段落,“展開部分”是提示實現(或解決)方法的段落。如果預示的是好運,就會提示更加鞏固和實現的方法,而如果預示的是厄運,就會提示克服厄運和轉禍為福的解決方案。此時,有當事者積極尋求解決方法的,還有預知者主動出點子的消極方法。另外,在預示厄運的故事中,預知者本身會

有解決的方案。

第三段落,“高潮部分”陳述了實現(或解決)方法的可行或不可行的過程。此時,如果實行解決方法,大體會出現幸運的結果。但如果不實行解決方法,就會迎來不幸的結果。不能實行的原因有出現無法實行的極限情況,或者還有當事者有意不實行的多種情況。而這一段落在整體敘事過程中是最詳細、最有意思的階段,特別是處於厄運中的人物克服厄運實行解決方法的過程。因為在解決厄運的過程中設有極限條件,而且也是對抗極度惡劣運氣的過程,所以當事者應該有堅強意志,并竭盡全力。一般情況下,單憑當事者的力量就無法解決問題,而是當事者得到非凡助手的協助解決問題。能夠認出非凡助手的能力也是由預知者擁有。其實,對未來的預測來說,接受它的人的態度很重要。在預知未來型故事中,預知的內容和實現、解決方法的受用與否成爲重要課題。可以說接受者的態度和理解很重要,如果接受者採取積極的態度樂觀地接受它,就能夠解決缺乏狀態,但如果誤解和不接受預知內容,就會失去原本的充足,所以這一部分成爲重要環節。

第四段落,“解決部分”是出現幸運或不幸的結果。有時,這一部分不提示結果,這種情況使讀者對故事結尾產生懸念,此時讀者對未來的態度是開放的。

從以上四個敘事段落來看,第一敘事段落省略了叫“缺乏狀態”的前提段落。預知內容的存在前提是缺乏狀態。所謂的缺乏狀態,包括不滿足、心願、混亂狀態、甚至欲望或野心等內容,而預知未來行爲會解決這種欠缺狀態,逆轉情況或讓故事按當事者所願的方向發展。預知未來型故事是在民間傳承已久的敘事物,其敘事內容不是固定於現在,而是向未來開放。

IV. 《太平廣記》文本中的預知未來型故事及其民俗內涵

1. 《太平廣記》文本中預知未來型故事的分布狀況

衆所周知，《太平廣記》五百卷是於宋代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由李昉等十二人奉太宗之命主持編纂，而於次年(公元978年)完成的中國最早的一部文言小說總集。它收錄了上起先秦兩漢下至五代宋初的將近 7000則故事³²⁾，亦可說是一部內容和數量非常龐大的敘事文本總集。明刻本書前有一個引用書目共為 343種，但實際引用的書目共為 475種。其內容大體可分為 92 大類，而再細分為 150 多小類。其中，預知未來型故事大約占有三分之一的分量，結構較為完整，能夠體現出當時民衆欲求探索未來的意識形態，是一個相當大的故事類型群。這類故事在各大類目中占有多少篇，參看以下圖表，可以一目了然。

《太平廣記》“預知未來型故事”分布表

編號	大類目錄	篇數	編號	大類目錄	篇數
1	神仙類(55卷)	122篇	32	樂類(3卷)	15篇
2	女仙類(15卷)	24篇	33	書類(4卷)	0篇
3	道術類(5卷)	11篇	34	畫類(5卷)	7篇
4	方士類(5卷)	38篇	35	算術類(1卷)	8篇
5	異人類(6卷)	32篇	36	卜筮類(2卷)	24篇
6	異僧類(12卷)	31篇	37	醫類(3卷)	31篇
7	釋證類(3卷)	9篇	38	相類(4卷)	53篇
8	報應類(33卷)	218篇	39	技巧類(3卷)	2篇
9	徵應類(11卷)	216篇	40	博戲類(1卷)	1篇
10	定數類(15卷)	128篇	41	器玩類(4卷)	6篇

32) 據有人統計，《太平廣記》故事總共輯集了 6970 個故事。此書之所以主要特点為“廣”，是因為從六朝到宋初的小說幾乎全書在內。

11	感應類(2卷)	22篇	42	酒類(1卷)	0篇
12	讖應類(1卷)	37篇	43	食類(1卷)	0篇
13	名賢類(1卷)	0篇	44	交友類(1卷)	0篇
14	廉儉類(1卷)	2篇	45	奢侈類(2卷)	0篇
15	氣義類(3卷)	3篇	46	詭詐類(1卷)	0篇
16	知人類(2卷)	17篇	47	諂佞類(3卷)	3篇
17	精察類(2卷)	9篇	48	謬誤類(1卷)	0篇
18	俊辯類(2卷)	1篇	49	治生類(1卷)	0篇
19	幼敏類(1卷)	2篇	50	褊急類(1卷)	0篇
20	器量類(2卷)	0篇	51	詼諧類(8卷)	0篇
21	貢舉類(7卷)	10篇	52	嘲諷類(5卷)	1篇
22	銓選類(2卷)	3篇	53	嗤鄙類(5卷)	1篇
23	職官類(1卷)	1篇	54	無賴類(2卷)	0篇
24	權幸類(1卷)	2篇	55	輕薄類(2卷)	1篇
25	將帥類(2卷)	0篇	56	酷暴類(3卷)	0篇
26	驍勇類(2卷)	1篇	57	婦人類(4卷)	8篇
27	豪俠類(4卷)	3篇	58	情感類(1卷)	1篇
28	博物類(1卷)	5篇	59	童僕奴婢類(1)	1篇
29	文章類(3卷)	0篇	60	夢類(7卷)	146篇
30	才名類(1卷)	0篇	61	巫壓類(1卷)	4篇
31	儒行類(1卷)	1篇	62	幻術類(4卷)	2篇
63	妖妄類(3卷)	7篇	78	石坡沙類(1卷)	7篇
64	神類(25卷)	144篇	79	水井類(1卷)	7篇
65	鬼類(40卷)	223篇	80	寶類(6卷)	33篇
66	夜叉類(2卷)	3篇	81	草木類(12卷)	21篇
67	神魂類(1卷)	7篇	82	龍類(8卷)	35篇
68	妖怪類(9卷)	103篇	83	虎類(8卷)	12篇
69	精怪類(6卷)	15篇	84	畜獸類(13卷)	53篇
70	靈異類(1卷)	8篇	85	狐類(9卷)	27篇
71	再生類(12卷)	84篇	86	蛇類(4卷)	26篇

72	悟前生類(2卷)	9篇	87	禽鳥類(4卷)	39篇
73	塚墓類(2卷)	21篇	88	水族類(9卷)	38篇
74	銘記類(2卷)	20篇	89	昆虫類(7卷)	33篇
75	雷類(3卷)	10篇	90	蠻夷類(4卷)	3篇
76	雨風虹類(1卷)	15篇	91	雜傳記類(9卷)	2篇
77	山溪類(1卷)	5篇	92	雜錄類(8卷)	8篇
總計：共2281篇					

在這種行行色色的《太平廣記》故事類型中，該類故事不同於其他類型故事，它包含的“預知未來”母題具有非常明顯的敘事特徵及其獨特的文化內涵。但筆者在閱讀《太平廣記》文本時，發現有關“預知未來”的故事確實很多。再說，帶有“預知未來”母題或情節的故事在《太平廣記》6000多則故事中大約占有三分之一的分量，即為2000多則故事。因此，在資料整理方面，碰到很大的困難。尤其，相當數量的故事只帶有簡單的“預知未來”母題，而且這些母題在故事展開中起到的作用也不是很大。加之，有些故事同時帶有很多其他與“預知未來”主題互無關係的母題。因此，有些故事雖然帶有“預知未來”母題，但無法歸屬於該類型故事。

筆者通過已有的《太平廣記》研究資料，例如《太平廣記故事集(吉凶預兆、占卜相術)》³³⁾等書，就可以知道《太平廣記》92大類中載於“徵應類”、“定數類”、“感應類”、“讖應類”、“算術類”、“卜筮類”、“醫類”、“相類”、“夢類”、“巫類”等10大類目中的大部分故事都屬於非常典型的“預知未來型”故事。那麼，這些10大類目分別收錄了哪些內容的故事呢？“徵應類”收錄了關於對未來之事的預言得到驗證的故事；“定數類”記載了關於命中注定的運氣方面的故事。尤其，這類故事關注於婚緣方面的問題；“感應類”收錄了心誠所帶來的報應方面的故事；“讖應類”記錄了關於對未來之事做出不吉預言的故事；“算術類”收錄了關於對死亡日期、未來災禍、天文變化等內容進

33) 參見鄧安生等人點注，《太平廣記故事集(吉凶預兆、占卜相術)》，(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年)。

行算數上的預測及其得到驗證的故事；“卜筮類”記錄了關於通過占卜活動預測未來吉凶禍福等內容并精通於陰陽歷數的故事；“醫類”記錄了關於具備神奇醫術的醫人的故事；“相類”收錄了關於相面的故事，故事中往往出現李淳風、袁天罡等著名相面家；“夢類”記錄了關於做夢之後得到驗證等夢兆方面的故事；“巫類”載錄了與巫術相關的故事。但在這些 10 大類目故事中反復出現的“預知未來”母題是非常定形的。因此，有些故事只是“角色(人物)”和“預知方式”不同，而在“情節”和“主題”方面大體上大同小異。這跟作為類書的《太平廣記》的敘事特徵有密切關係，但不可避免在故事中反復出現同樣內容或母題的情況，只能研究比較定形化的母題。反而，這有助於筆者可以避免多種母題交纏不清的問題。

其實，除了上述範圍之外，還有很多該類故事作品遍布於《太平廣記》文本。但由於其數量頗為龐大，筆者只能把這些故事作品作為輔助資料。其中，“道術類”，“方士類”，“異人類”，“異僧類”，“釋證類”，“報應類”，“知人類”，“貢舉類”，“銓選類”，“靈異類”和“塚墓類”等類目，都收錄了較為針對的“預知未來型”故事作品，其內容也較為豐富多彩。例如，屬於“道術類”、“方士類”、“異人類”和“異僧類”等類目的故事，主要講述了關於具有擅長預言、除災等超凡能力的異人行蹟。這些故事有助於觀察故事中異人的面貌；“釋證類”故事，主要講述了關於佛教證驗的內容。這些故事有助於觀察預知未來行為的宗教性(尤其為佛教信仰)特徵；“報應類”故事，也主要收錄了關於佛教的內容。其內容大都為因讀寫佛經或建造佛像等功績而獲得報應。在此，預知未來行為是往往被利用為突出佛教信仰心的手段；“知人類”故事，主要講述了有關善於根據言行鑑識某人或預知某人將來事情的人物行蹟；屬於“貢舉類”和“銓選類”等類目的故事，主要講述了與科舉或選人相關的夢兆、預言、知人等簡單內容。這些故事有助於觀察預知未來行為的歷史性特徵；“靈異類”故事，主要講述了有關神靈證驗的內容；“塚墓類”收錄了有關塚墓由來或根據風水好壞決定子孫將來吉凶等問題的故事。這類故事主要介紹了“預知方式”之一的風水內容。

無論如何，《太平廣記》故事的大部分內容以神話傳說的神異性和宗教

的靈驗性為主要特点。這些特点在《太平廣記》故事中以各種方式展現其內容。尤其，呈現神異性內容的方法有變身、報應、祝願、幻夢、預兆、預言等各種方式。其中，有關“預知未來”的行為方式，可說為更有效地突出神異性特点的代表母題。其實，預知未來型故事的分類主要是根據母題的分類，所以每個故事中具體的預知未來母題也會隨着故事數量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見，根據“預知未來”母題的分類，就是可以包容多種類型故事的開放性體系，而不是只能包容單一類型故事的封閉性體系。因此，如果以寬大的分類標準尋找預知未來型故事，其數量就會幾何級數上升。

2. 《太平廣記》預知未來型故事的民俗內涵

這類故事不僅深刻反映着人們對命運的種種觀念，而包含着故事傳承階層對人生的認識態度及其民俗生活內涵。這就是考察“預知未來”母題在《太平廣記》文本特有的敘事結構上起到甚麼作用以及發揮甚麼功能的問題。中國古代民間信仰，尤其是“預知未來”的內容對古代敘事文學的影響很大。有時，這些有關“預知未來”的內容對故事情節的發展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太平廣記》把當時“預知未來”的民俗事象帶進很多故事之中，不僅表現出有關的文化內涵，而且使得敘事展開更加曲折、有趣。眾所周知，預知未來型故事富含民俗內容，而這些內容被古典小說採納和傳承之後，在其中擔負着多種功能。所以筆者認為，文獻故事中“預知未來”情節分析應該有助於當時人們的生活情感和思考方式，甚至有助於作為故事發展體裁的古典小說的研究。

如見漢人張衡《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薛綜注謂：“小說，醫巫厭祝之術。”³⁴從此句上看，小說也應該記述了很多關於符咒或預言的故事。我們從《太平廣記》中諸如神仙、女仙、道術、方士、異人、異僧、釋證、報應、微應、定數、感應、讖應、卜筮、醫、相、情感、夢、神、鬼、

34) (漢)張衡(注)薛綜,《西京賦》,載於《文選》。

夜叉、神魂、妖怪、精怪、靈異、再生、悟前生、狐等類目的設置，可以看到古人對小說的興趣所在，幾乎都與民間宗教信仰有關。因此，探析《太平廣記》作品中的“預知未來”母題，就可以說是一道闡釋傳統時期人們的生活感情以及思考方式的通路，進而對古代小說(即可說為從故事發展下來的體裁)研究也有所幫助。

《太平廣記》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對世相民俗的記載，彌補了我們從正史典章中全面觀照古代中國社會文化生活視角的不足。《太平廣記》的文化面貌是多層面的，其承載的社會心態、反映的文化視角等，都應該作為對這部大型類書整體文化觀照的一部分。³⁵⁾由此可知，它在中國民間故事和民俗研究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時，我們值得注意的是，它雖然不是正統的歷史記錄，但卻擺脫歷史記錄的界限，而自由記載極為豐富的民間故事和民俗資料。

民間敘事文學既是文學，又是民俗，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³⁶⁾。即，一是從文學視角；二是從民俗視角；三是從即是文學又是民俗的民間敘事獨立視角去理解。正如董乃斌先生所述：“民俗學視角對於文學內部關係的研究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這是因為文學藝術的源泉是人民的社會生活。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不打上民俗烙印的社會生活，任何時代、任何樣式的文學，其內容實際上都離不開一定的民俗。”³⁷⁾所以本文要同時考慮文學和民俗兩個方面，來了解《太平廣記》這一文本。尤其，筆者要把它當作了解傳統時期民間信仰之一的“預知未來”行為及通過它體現的當時生活狀態、思想、觀念等的窗口。

35) 參見霍明珉, <對《太平廣記》的社會文化觀照>, 載於《社會科學戰線》第6期, 長春: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 2005年。

36) 參見(韓)趙東一, <韓國說話研究的現況>, 載於《韓國日本的說話研究》, 仁川: 仁荷大學出版部, 1987年 9月。

37) 參見董乃斌, <文學史研究的民俗學視角>, 載於《人民政協報》第4版, 北京: 人民政協報社, 2000年 9月 29日。

(1) 預知未來型故事與宗教觀念

見清代《太平廣記·黃氏版本序》曰：“以道藏釋野史稗官之類，廣採兼收集為五百卷，賜名曰太平廣記。”³⁸⁾從此可知，《太平廣記》文本具有廣汎收錄各種宗教內容的敘事特徵，呈現出儒、道、釋三家已自成一統又渾然一體的面貌。其實，“預知未來”行為是跟人們的“命運觀念”密不可分。但是，這種命運觀念之所以不可一概而論，是因為它帶有很豐富的文化內涵，從而產生更細緻、更複雜的命運觀念。其中，儒教的“天命觀”對中國民衆的思想和行為起着很大的作用。並且，在中國土生土長的傳統宗教“道教”和在漢代從印度流入到中國的外來宗教“佛教”也對該類型故事起到不少影響。自漢代以來，儒教在國家或社會層面通過國家儀式行事了預知未來行為。相比之下，道教在民間層面以占卜個人生死禍福的形態出現。但是，儒教有出於統治理念，注重政治和禮儀，傾向於士大夫文化之嫌；佛教過於傾向超脫世俗的脫俗主義；道教最接近於基層百姓生活，與民間信仰一并融入到民衆意識和整體生活之中，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³⁹⁾。實際上，這些宗教帶着各自的特徵獨立存在，但它們在預知未來型故事中相互結合、交叉形成複合狀態。

(2) 預知未來型故事與民間信仰

民間信仰是在民間長期信奉傳承的自然宗教現象，即相信神靈統治人的生活、與人的命運密切相關的信仰。民間信仰反映從古到今的民間獨特生活情況和所有哀歡。民間信仰，又分為自然崇拜、神靈崇拜、占卜信仰、禁忌信仰、巫術信仰、圖讖信仰和咒術信仰等多種內容。其中，相當部分的內容與預知未來行為息息相關。可知，它在民間信仰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民間信仰一般由巫俗信仰、占卜預言信仰、風水信仰等形成大主流。巫俗信仰以神靈介入人間事支配吉凶禍福的思維方式為基礎，占卜預言信仰是關於人類命

38) (清)《太平廣記·黃氏版本序》。

39) 參見(韓)金洛必, <道教與韓國民俗(討論文)>, 載於《比較民俗學》第24輯, 安東: 比較民俗學會, 2003年, 第85~113頁。

運的信仰，風水思想有風水地理決定人生和歷史興亡盛衰的思維體系。

在民間信仰中，代表“預知未來”行為的“占卜”是根據某種線索獲取過去和現在所處的處境、未來事件、現在要行事的行為當為與否等信息的手段。人的原始本能在面臨無能為力而不確信的未來時需要這種占卜信仰，且通過這種行為確認行之與否，得到了心理的平安。在這種占卜信仰記載於文獻的“預知未來型”故事，充分反映了以上所述的民衆意識要素。

同時，我們還是不能忽略民間信仰的最重要部分之巫俗信仰。預知未來行為在巫術信仰中所占的比重也相當大。再說，通過接神傳達神意的巫人擔任司祭、治病(巫醫)、神秘解釋(預言)、招魂、祈雨、巫術等任務，並擁有相應的能力。其中神秘解釋，即占卜、預言、占夢等預知未來功能在巫術信仰中尤為重要。換言之，巫術信仰在傳統時期具有祭祀、求雨、接神、祈禳、占星、卜筮、占夢、相面和醫術等多種功能。其中，相當部分的功能與預知未來活動有密切關係，令人注目。另外，風水信仰被視為決定人類吉凶禍福的超自然作用，也是占據民間信仰一席之地。民間信仰中的這些預知未來行為，在敬天崇神的觀念上，反映人類企圖讀解神意、預測未來的基本心理。

中國民間信仰受到“造神運動”⁴⁰⁾的影響，有時包容儒、佛、道的內容或神格，因此出現儒、佛、道的信仰混淆的現象。尤其，道教在很多方面與民間信仰特徵相同，因此中國民間信仰通常與中國本土宗教“道教”被一視同仁，或被視為與道教相關的信仰(即為道教的世俗化)⁴¹⁾。其實，在中國，道教接納了很多民間信仰要素，所以民間信仰和道教神的位置沒有明顯區別。尤其，(北斗)七星是在民間信仰中掌管壽命、富貴、吉凶、禍福等的神之位置，從以上所述的佛教和道教中也能發現其根源。此外，城隍、玉皇大帝、竈王，關雲長(關帝)信仰也都如此。就這樣，中國民間信仰與周邊宗教習合，廣汎影響了社會，也擁有豐富多彩的內容。“預知未來”活動也是其中之一。

40) 所謂民間的“造神運動”，是指一種大規模驅動民衆力量，把某個對象高舉至神的地步，並要民衆向它們膜拜，當作神明所供奉及建廟。

41) 參見(韓)朴志玆，〈中國民間信仰中的“造神”運動〉，載於《中國學報》第51輯，首爾：韓國中國學會，2005年，第135~156頁。

但這種“預知未來”活動跟其他民間信仰活動比較起來，至今還在民間帶有很強大的生命力。其原因是甚麼呢？筆者認為，這是因為“預知未來”活動跟老百姓的現實生活問題有密切關係。如果民間信仰的基本性質是“祈福”信仰，就不難發現其“祈禱”內容是長壽、發財、健康、騰達等民間老百姓一生戀戀不忘的夙願。

(3) 預知未來型故事與民俗生活

故事的講述者從自己的經驗中摸索出對於自己行為的解釋和邏輯，并把這些經驗納入和反映於這一類故事之中，抱着富貴、長壽、子孫等所有人都向往的夢想克服命運，而故事中的主人公為實現夢想在竭盡全力。尤其，夢兆是最為普遍的預知未來行為，不僅內容豐富多彩，而且很多關於夢兆的判斷吉凶也已常識化了。這也許是因為做夢是誰都能經歷的生理現象的緣故。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解夢和對夢的應付態度通過長期的經驗，在民間逐漸被普遍化和傳承下來，這并不完全沒道理。例如，“夢見屎就能發財”、“夢見洗頭病會好”等夢兆俗信⁴²⁾，是典型的例子。此外，既神秘又非科學的夢兆，不僅出現在野史或傳說等虛構性質較強的文學體裁中，在重視歷史真實性、客觀性、科學態度的正史文獻中也大量記載了有關夢兆的故事。從此可見，傳統時期的人們通過經驗，從意識里認為夢是真實的。

本文所說的“預知未來”，是指以某些線索(占卦、自然現象、地形、夢境、人物的長相或外貌、歌詞、詩文等)為依據，在處事之前獲取有關未來事情的信息或打聽妥當性與否的行為。筆者認為，此時得到的線索和信息比起現實經驗和科學數據，視為更具有超自然的神秘感。但這種超自然、神秘的預知未來行為，實際上多半都來自現實經驗。此外，從很多來自於日常生活中經驗的俗信，還可以發現常識化的預兆，即有“早上鵲鳴有貴客”、“看到蜘蛛來客”等例子。還有，觀察自然，占卜一年農活的吉凶：如有對滿月月

42) 相關內容，見於《新集周公解夢書》曰：“夢見屎尿污衣，大吉”和“夢見梳頭者，百事散”。參見劉文英，《中國古代的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重版) 第41頁。

光的觀察，對星星運行的觀察等⁴³⁾。可見，在日常生活中已經常識化的“預知俗信”並不是原來就有的。多半是先有其結果，接着追溯原因後，在其多次反復的過程中產生一種常識性判斷。其中，還有很多基於人的事理辨別力或其他生活習慣等推理形成的常識判斷⁴⁴⁾。另外，在揪出罪犯、判斷井水水質等日常生活中需要決定某件事情時，也被運用了。

每個人的一生都有必需經歷的重要時刻，它通常被稱為“通過儀式”或“人生儀禮”：如出生、成人式、結婚、葬禮等。這些瞬間對人都有特殊意義，也伴隨相應的禮儀。這些重要的通過儀式都會引起人們對未來的好奇。首先，要了解一下通過儀式中占首位的，即關於出生的預知未來行爲。人們在傳統時期很重視傳宗接代，尤其在傳宗接代依靠兒子的出生得以延續的社會，格外重視出生禮儀。其中，在爲求子而行的祈子信仰、妊娠、分娩等習俗中，出現了很多與預知未來相關的行爲⁴⁵⁾。其中，胎夢是最具代表性的、出生相關的預知未來行爲。胎夢是以解夢來預測懷孕情況的預知未來行爲，在此根據夢境預測胎兒的孕胎情況及性別，甚至預測胎兒的未來命運。可見，體現超自然神秘性的“預知未來”行爲已經自然融入人們生活領域的禮儀活動(儀式)之中。還有，葬禮、祭祀等儀式與風水故事有深淵的關係。特別在墓地的選擇上，與敬仰祖先思想、盡孝思想密切相關的風水思想認爲：若將祖先安葬在風水寶地，就可以求到子孫的榮華富貴。如此，與風水有關的葬禮習俗已流傳很久。

通過前面的論述，我們了解到：這類故事，透過命運當事者借以助手的

43)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例子，舉不勝舉：如“螞蟻集會，天要落淚”，“欲知後月雨，先看前月二十五”，“春天多風，秋天多雨”，“清明晴，百事成”等等。參見(美)歐達偉(R. David. Arkush)，董曉萍譯，《中國民衆思想史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58~60頁。

44) 參見(韓)曹壽鶴，〈兆朕的理論與實際〉，載於《新羅文化祭學術發表會論文集：新羅宗教的新研究》第5輯，慶州：東國大學校新羅文化研究所，1984年，第83~136頁。

45) 參見(韓)朴大福，〈說話主人公的出生與民間信仰〉，載於《韓國民俗學》第20輯，首爾：韓國民俗學會，1987年，第109~132頁。

預知能力克服困難的情節，表現出人們企圖借助預知未來的行為以掌握將來某種事情的積極愿望，便產生了吸引人們的魅力。每個人都有“追吉避凶”的心理，而這種“追吉避凶”的心理可謂是預知未來行為的核心。但實際上，不是所有“追吉避凶”心愿都能容易實現的。所以，人們為了人為克服自己現在所處的缺乏狀態，做出努力。在預知未來型故事里，可以見到人們的這種努力痕迹。預知未來型故事很好地體現了民間老百姓追求榮華富貴、追求幸福的心愿：即體現了民間的現世求福觀念、敬仰祖先的盡孝思想、天地人合一的命運意識等民俗心理。

V. 結語

本文在以上探討了古代文獻中的“預知未來型”故事及其民俗意義。但這不是民俗學研究最重要方法之一的現場調查研究，這只是靠記錄文獻進行的研究，所以也有不能考察民間活靈活現故事面貌的遺憾。而本文選為研究對象的《太平廣記》中故事已是歷史悠久的古代故事，除非利用時光倒流機跳到過去，則只能通過文獻間接地推測當時民衆活靈活現的生活狀態。不過，更遺憾的是本文還沒做到歷時性和共時性，即《太平廣記》故事與現、當代中國及韓國同類故事之間的比較研究。這只能留給今後研究。

在不斷變化的時代環境中，應重新建立能夠保障人類生活質量的價值觀和文化。本文通過反映傳統自然生活面貌的文化裝載物之《太平廣記》“預知未來型”故事的研究，明確了解到含在其中的思想意義和生活智慧。同時，正如本文主題所望，希望能夠為更好的文化創作提供寶貴的基礎。

< 參考文獻 >

(宋)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共十冊)》，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鄧安生等點注，《太平廣記故事集(吉凶預兆、占卜相術)》，北京：北京廣播

- 學院出版社, 1999年。
- 丁世良等主編, 《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89年。
- 鐘敬文, 《鐘敬文民俗學論集》,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8年。
- 鐘敬文, 《鐘敬文民間文學論集(上、下)》,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2、1985年。
- 錢鐘書, 《管錐編》(1~5冊), 北京: 中華書局, 1986年 重版。
- 李斌城、李錦綉等, 《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年。
- 程薔、董乃斌, 《唐帝國的精神文明》,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年。
- (德) 艾伯華(譯) 王燕生等, 《中國民間故事類型》,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9年。
- 石昌渝, 《中國小說源流論》, 北京: 三聯書店, 1994年。
- 祁連休、程薔主編, 《中華民間文學史》, 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
- 李季平、王洪軍主編, 《太平廣記社會史料集萃》, 濟南: 齊魯書社, 1999年。
- 趙維國, <論《太平廣記》纂修的文化因素>, 《河南大學(社科學報)》 3期, 2001年。
- 王立, <宗教民俗與中國古代小說若干母題的文化省察>, 上海師範大學中文學科 博士論文, 2000年。
- 李漢濱, <《太平廣記》的夢研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科 博士論文, 2002年。
- (韓) 金烈圭等, 《民談學概論(從傳播論到結構主義)》, 首爾: 一潮閣, 1982年。
- (俄) 普羅普(韓) 劉永大譯, 《民譚形態論》, 首爾: 새문사, 1987年。
- (韓) 金鉉龍, 《韓中小說說話比較研究(太平廣記的影響及其他)》, 首爾: 一志社, 1976年。
- (韓) 張德順, 《韓國民俗與文學》, 首爾: 圖書出版 박이정, 1995年。
- (韓) 諸海星, <淺談《太平廣記》的小說史料價值>, 《東西文化》 第33輯, 大邱: 啓明大學校東西文化研究所, 2000年。

<국문제요>

《太平廣記》500권(卷)은 송대(宋代) 태평흥국(太平興國) 연간에 이방(李昉) 등 12명이 태종(太宗)의 명을 받들어 편찬한 중국의 설화집으로, 위로는 선진양한(先秦兩漢) 시대부터 아래로는 송대(宋代) 초까지 장장 7000 여 편에 달하는 이야기들을 수록하고 있다. 내용과 수량 방면에 있어서 매우 방대한 분량의 서사 텍스트로, 학계에서는 통상적으로 《太平廣記》를 “소설의 바다(小說的淵海)”라 부르고 있다.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小說家類)》에 실린 《太平廣記提要》를 보면, 《太平廣記》의 이러한 소설사적인 가치와 여기에 수록되어 있는 소설의 기원에 관해서 이미 잘 말해주고 있다. 이를 통해, 소설사 연구자들에게 있어서 《太平廣記》 텍스트가 얼마나 중요한 자료인지 짐작할 수 있다. 하지만 중국 고대의 “소설(小說)”에 대한 개념은 현재 우리가 말하고 있는 현대적인 의미의 “소설(小說)”과는 상당한 거리가 있었다. 소설의 기원에 대한 반고(班固)의 “패관설(稗官說)” 주장은 고대의 소설이 내포하고 있는 민속학적인 의의를 살펴보는 데 있어 중요한 실마리를 제공하고 있다. 당시 집정자들은 정치활동의 일환으로, 백성들의 생활과 풍습을 살펴보기 위하여 “패관(稗官)”이라는 제도를 설립하고 국민들의 여론을 수집하여 정치에 반영하고자 하였다. 사실, 정식적인 역사 기록인 정사(正史)의 관점에서 본다면, “소설(小說)”은 “항간에서 떠도는 근거 없는 풍문이거나 꾸며낸 이야기”에 불과하기 때문에 기록할 만한 가치가 없었다. 하지만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소설이 정식적인 역사 기록에 포함된 것은 아마도 백성들의 감정과 생각을 기층해볼 수 있는 지표로 인식되어졌기 때문일 것이다. 이를 통해, 우리는 당시의 집정자들이 민정(民情)을 살펴보기 위하여 민간에서 떠도는 이야기들을 수집해오도록 파견 보냈던 “패관(稗官)”의 역할이 오늘날 민속자료를 조사하기 위해 현지로 답사를 떠나는 민속학자의 역할과 상당히 비슷하다는 사실을 알 수 있다. 그러므로 어떤 의미에서 본다면, 《太平廣記》에

수록되어 있는 전통시기의 소설들은 오늘날 우리가 말하는 “옛날이야기(民間說話)”에 더욱 근접해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필자는 위와 같은 논지를 바탕으로, 《太平廣記》텍스트의 民間敍事(民間敍事)적인 특징을 살펴보고, 더 나아가 《太平廣記》텍스트 속의 미래예지형 이야기를 통해 그 속에 묻어 있는 당시 이야기 향유계층의 삶에 대한 인식태도와 민속적인 함의에 대해서도 함께 살펴보았다.

주제어 : 《太平廣記》, 소설, 民間敍事, 미래예지, 민속

